

[美]汉娜·阿伦特 等  
By Hannah Arendt etc / 著

喧嚣时代的  
独特声音

#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PECIFIC  
VOICES IN  
THE NOISY  
TIMES

# 暴力与文明

入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推荐图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力与文明 / (美) 阿伦特等著; 王晓娜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04-4195-0

I. ①暴… II. ①阿… ②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①Z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9934号

### 暴力与文明：喧嚣时代的独特声音

---

作者: [美]汉娜·阿伦特等

译者: 王晓娜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4195-0

定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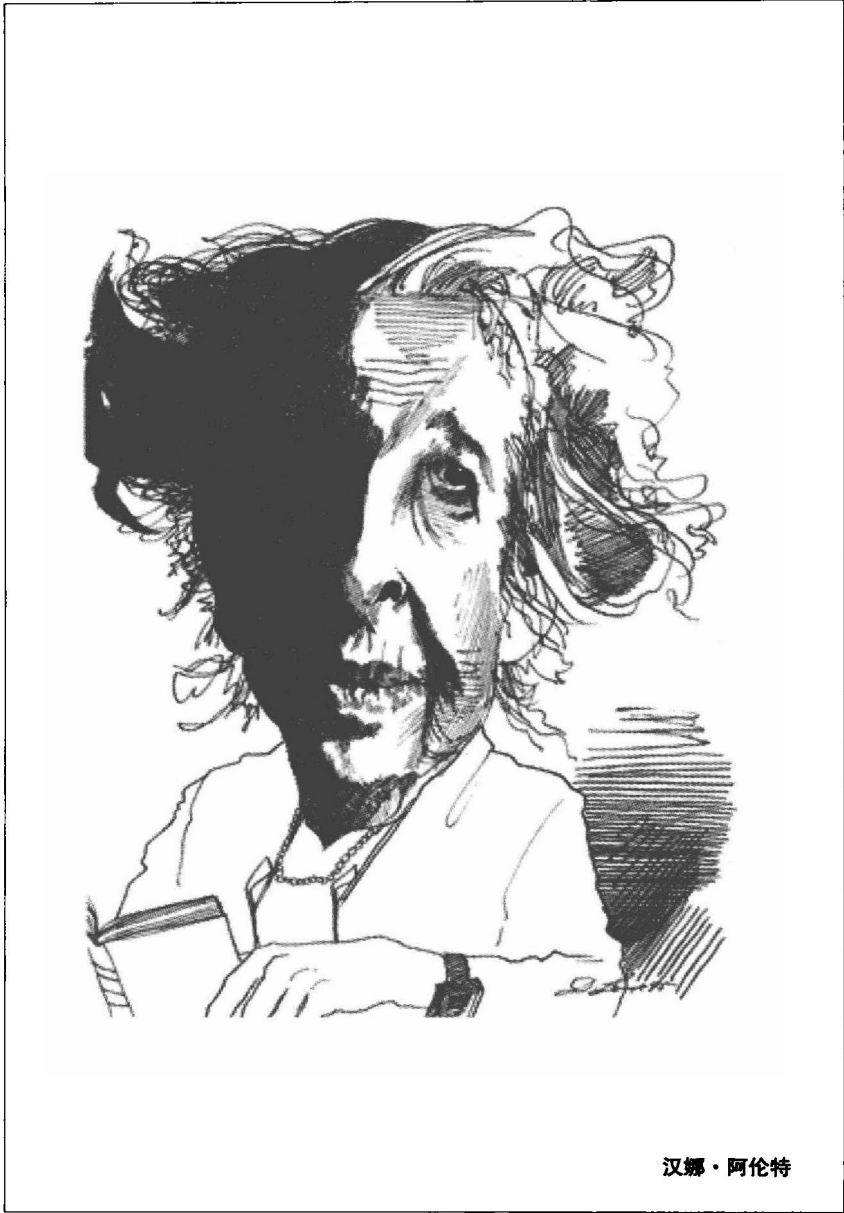
---

汉娜·阿伦特	关于暴力的思考	/1
斯特拉文斯基	生命之泉	/31
	——关于贝多芬的一次访谈	
安德列·萨哈罗夫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	/41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61
以塞亚·伯林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79
罗伯特·赫斯	安迪·沃荷的崛起	/97
加布里埃尔·安南	来自柏林的女孩	/117
布鲁斯·查特温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133
Thich Nhat Hanh	一个僧侣诗人在越南	/157
彼埃尔·布莱兹	马勒的重现	/169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瓦兹事件之后	/185
琼·迪迪安	在萨尔瓦多	/195
W.H.奥登	偏头痛	/215
约瑟夫·布罗茨基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225
罗伯特·洛威尔	两个诗人	/241
戈尔·维达	热爱飞翔	/257

# 关于暴力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思想家。原籍德国，1928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抢救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死后声誉日隆，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以及《论暴力》(*On Violence*)。本文最初发表于1969年2月27日的《纽约书评》，是《论暴力》的精华部分，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汉娜·阿伦特

—

**这**些思考是由前几年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件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它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弈，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出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获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的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气力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要。暴力行为的本质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这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这既合情合理，也是必需的，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



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的因素，没有什么地方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但人们却很少重视暴力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成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他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或经济的持续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政治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适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得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它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





法国革命者乔治·索列尔，主要著作有《暴力论》等。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时感到悲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个人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军队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着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sup>①</sup>在20世纪初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sup>②</sup>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程度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

<sup>①</sup>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 主要著作有《暴力论》、《进步的幻想》等, 对革命论者影响很大。

<sup>②</sup>法农(Franz Fanon), 1925—1961,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出生于阿尔及尔, 以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写作而闻名, 主要著作有《黑皮肤、白面具》、《大地的不幸者》等。

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知道战争中会大批地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使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力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他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然未被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威胁到某些失业阶层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

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和“五年以后你希望你的生活是什么样？”那么，在得到回答之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地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高调的问题，但正是这种穿插着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的高调让人迷惑不解。谁还可能把在“无阶级游民”（引用法农的话）身上树立信心、相信“流氓无产者是城市革命的先锋”、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引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呢？萨特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复就是能治愈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的理想还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同，例如，“宁可维护自尊忍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

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也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地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

汉娜·阿伦特的代  
表作《论暴力》



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当他们面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成立于1871年3月18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失败于1871年5月28日，历时72天。

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梦想着一个“最末尾成为第一，第一沦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

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知，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象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是这样的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的确存在着“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的事情，并在殖民地自治时代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语）作为新的口号，那就会更大规模地重复马克思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远远没有他的幻想那样理由正当。

现在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与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

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又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本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不是曾支持并颂扬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吗？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是也曾发表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著名口号吗？但马克思并未把公社理解成为一个新的政府形式，而是革命行动所必需的一种暂时性的机构：“一种最终发现的实现了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种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等同的。列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无论如何，正是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减并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力转交给了共产党。）

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怯懦。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一党官僚制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即将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是操纵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与的可能。我无法确定最终将如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十九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体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

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地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地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旧社会都蕴含着新社会诞生的因子，正像每个有机体都蕴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惟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确切地说，将最后的分析仅仅建立在一个隐喻上的这种保证，并非一个学说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正是依靠这样的保证提出了大量哲学的学说。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历史观点作一下比较，它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例如，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同一事物的永恒反复的出现，一些本质上无任何联系的事件所呈现的偶然性顺序——所有这些都找到记载而且都合乎情理，但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连续并因而确保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被看作是世界之初、万物之源的黄金时代<sup>①</sup>这一古老的认识，但它所提示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持续衰退的确凿事实。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它的缺点。它不仅能在不中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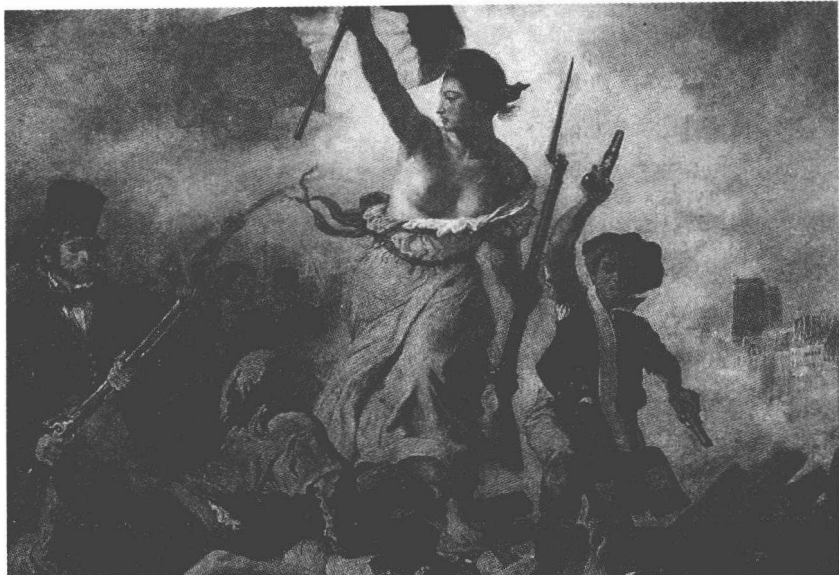
<sup>①</sup>黄金时代(Golden Age)，在拉丁文学中指约公元前70年—公元18年这段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文学成就突出的时期。



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历史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的回答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我们现今所有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于这一看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

我无需补充说，20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和伪科学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它们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而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暴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二

我就是以这些体验为背景，意欲在政治领域提出暴力这一问题。

这并非容易的事，因为索列尔在六十年前就曾说过：“暴力产生的种种难题仍然很令人费解。”今天的情况与当时并无任何不同。我在提及普遍不愿谈论暴力的现象时，曾把它看作是个别现象，现在我必须重新斟酌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对权力现象的描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到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C·莱特·米尔斯<sup>①</sup>这样写道：“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就是暴力。”他似乎是在响应韦伯对国家机器的定义：“以暴力这种所谓的合法的手段为基础的对人的统治。”

很奇怪，居然会有这种一致的见解，因为只有同意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这一见解，把政治权力与

<sup>①</sup> 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1962, 美国社会学家，专门从事马克思、韦伯以及现代生活中知识分子作用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白领阶层》、《当权人物》、《马克思主义者》等。